

“现代”飓风中的县城空间

——张楚《云落》读札

王云芳

《云落》是作家张楚的长篇小说，2024年6月出版。小说仿佛清明上河图，生动地勾勒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空间——小县城云落。

县城是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，有着“中间过渡”的属性，它比乡村经济发达，更紧跟时代潮流；但又比大都市落后，总是跟在大都市后面蹒跚学步。中国文学中，早已有悠久的乡土文学传统；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腾飞，都市文学作品也比比皆是。县城的位置似乎比较尴尬，总是被忽视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县城逐渐进入作家们的关注视野。这里集中了许多“70后”作家的生命体验，当他们在大都市站稳脚跟，回望来时路，故乡有了幽暗复杂的面孔。因此，张楚借《云落》书写县城，既是在回望个体的生命体验，也是为反思那个飞速发展的年代。

《云落》中的县城，外在景观上是中国许多县城的缩

影。小小的县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矗立着许多千人一面的高楼大厦。小县城中的的人，也被现代风气裹挟着踉跄前行。有头脑灵活者，得“现代”风气之先，如罗小军之类，物质丰腴后追求“食不厌精”。然而，这样将物欲追求发挥到极致的“现代”，是我们想要的吗？张楚对此是存疑的。因为《云落》中虽然写了许多美食，最暖心的依然是主人公童年时的独特味道。

小县城的背后，潜隐的参照物是大都市。“70后”的一代人，正赶上城镇化的浪潮。一些人通过高考、打工等机会，在大都市漂泊。然而，大都市并不是人间天堂。失去文化根脉的滋养，一些人表现出了水土不服的症候，不经意间总是流露出浓浓的厌世气息。要么异化为机器，一味地追求物欲满足；要么富裕之后又精神空虚，愚蠢地相信所谓灵修。节假日时，他们又借各种机

会逃离千篇一律的现代生活，试图去别处实现诗意的栖居。然而，传统文化的根脉在哪里？与之相连的生命力在何处？

所谓礼失求诸野，张楚试图透过《云落》告诉读者，生命力的源头仍在底层。小说不厌其烦地铺写云落的种种风物景致，无不是为了烘托生活在其中的人，尤其是那些活在底层的女性。她们生命力充沛、能吃能睡，耐得住生活苦难的折腾。三位女性主人公中，来素云离婚了，蒋明芳的丈夫死了，万樱的丈夫虽然活着，却是个植物人。面对似乎无望的生活，她们没有陷入悲伤绝望，而是默默地承受着生活所赋予的一切。

张楚把一种理想的生命力寄托在这些女性身上，因此赋予了她们许多美好的品质。万樱敦厚宽容，有一双麋鹿般明净、温顺又倔强的眼睛；来素云泼辣能干；蒋明芳理性自尊，总说自己是硬

着头皮摸黑赶路。这些女性秉承着相对传统的价值观，但又尊重生命的本能，不为旧道德所束缚，在忍耐中逐渐游刃有余，淡然从容地面对生活。这种与生活尽力搏斗，虽狼狈但又不迷失自己的姿态，是她们身上最迷人的地方。她们的身上，彰显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柔韧顽强的生命力。

小说中，张楚采取了一种极有耐心的叙事方式。他不在意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，反倒用充足的笔墨去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。他的叙事有时显得“絮絮叨叨”，却常常暗含精妙的譬喻或是耐人寻味的哲思，仿佛一粒粒闪光的珍珠散落在文本的字里行间，让小说脱离出故事的羁绊，显示出纯文学的丰富与深邃。《云落》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告诉我们，“现代”飓风过后，废墟之中仍在坚守的人物身上那股柔韧的文化生命力，才是我们应该珍视的精神源泉！

学术大师的天津足迹 ——《缪荃孙年谱长编》读后

柳潜

杨洪升先生在其力作《缪荃孙研究》的基础上，又出版了新著《缪荃孙年谱长编》(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，下简称《年谱长编》)。全书分上下两册，八卷102.6万字，详细介绍了这位近代学术大师的一生，勾画了他对整个近代学术界、思想界的重要影响。

缪荃孙早年入选翰林院，在京城建立了学术声名；晚年寓居沪上，成为坚守旧学的代表名宿。像这样的学术大师，旅居之处，均有不少重要交流。在《年谱长编》中，就大量记述了缪荃孙与天津的深厚因缘。

一是缪荃孙与天津渊源密切，与天津诸多重要人物有密切往来。《年谱长编》细致考订缪荃孙友朋书信，多次论及他与盛宣怀、章钰、傅增湘、吴重熹、费念慈等寓津学人的通信情况。其中，寓居天津的著名藏书家章钰与缪荃孙关系密切，今存他致缪荃孙信四十六通，既有讨论学术问题的，也有感谢缪荃孙对他进行帮助、资助的。但不少内容并未标注年份，《年谱长编》对此进行了细致考辨，更具体地展现出缪荃孙对天津学者的关注与帮助。

二是缪荃孙的著述与天津有直接关联。辛亥革命起，局势动荡中，缪荃孙从北京南下过天津，仍不忘记往天津图书馆观书。傅增湘请缪荃孙点勘《天津图书馆书目》，缪荃孙以一个月的工作完成。晚年寓居天津的李葆恂(文石)著有《无益有益斋论画诗》，缪荃孙以友人身份为其撰序，称赞此书与《藏书纪事诗》同为艺林宝筏。《年谱长编》引述相关内容，并且考论提及吴重熹、王先谦等人在书信中提及李氏的情况，清晰介绍了相关史事。缪荃孙去世后，缪文述《缪艺风先生著述目》刊载于天津《大公报·图书副刊》，系最早系统论述缪氏著述的重要研究成果。这表明天津学术界一直关注缪荃孙的成就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缪荃孙致潘祖荫书札，也是本书首先披露的珍贵文献。



霜晨行旅图 张精来

河北磁县贺兰山

谭汝为

隰州诗：“君家将军本逢掖，叱咤西摧贺兰石。”周邦彦《薛侯马》诗：“焉知不将万人行，横槊秋风贺兰道。”黄庶《送李室长庆州宁观》诗：“我生南方长诗书，爱国区区肺如炙。欲于塞外勒姓名，往往夜梦贺兰石。”北宋诗人喜欢以书写贺兰风物表达个人的特殊情志，这与北宋和西夏的冲突当然有一定关系；但就文学传统而言，这种表达英雄精神的“贺兰”，并非实指。

与宁夏贺兰山同名，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境内也有一座贺兰山，原名西山，距县城西北三十里，在今林峰村南面。据载，宋代道士贺兰

栖真曾在西山筑建道观潜心修炼，并接受宋真宗的召见。获此殊荣，名声愈加显赫。地方官员乃仰承“上意”，申报朝廷，将西山更名为贺兰山，将忙牛河易名为贺兰河，附近村落定名为东贺兰村和西贺兰村，并相延至今。清康熙三十九年(1700)刊印《磁州志》，其中“磁州境图”就明确标出贺兰山、贺兰河、贺兰村的位置。志文曰：“贺兰山在州西北三十里。山非高峻而蜿蜒起伏，长二十里。宋贺兰真人隐居于此，因以得名。”

磁县为官道要冲，在宋金交战时，磁州一带是黄河北岸的军事要地。抗

金名将宗泽曾驻守磁州。贺兰山虽不险峻，却是当时岳飞抗金的主要战场之一。岳飞曾率部多次往返，并在磁县西南驻扎，此地后称为“岳城镇”。后人为纪念抗金英雄，曾修建“岳穆庙”。《磁州志》记载：“岳城在县西南55里。宋建炎初年，岳武穆曾驻兵于此。”村北原有岳飞驻兵的遗址，人称“岳飞寨”。磁县有东候召、西候召、小候召三个村落，均以岳家军曾驻扎于此等候朝廷圣旨而得名。《磁州志》的“磁州境图”也标明了“岳城镇”和“武穆庙”的位置。

《满江红》“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”之句，不仅昭示了岳元帅的战略部署和行军路线，也表明他对磁县贺兰山军事要冲极为熟悉且十分重视。故将《满江红》所指之处定在磁县贺兰山——既有方志记载，又合乎战略方向，在逻辑上，亦顺理成章也。

随从的人说：今天去拜访一下某官。随从的人没听见，还是赶车回了家。这个陈音却以为到了他说的官员家，进去后四下打量，疑惑地说：他家怎么与我家环境全都一样？看见墙上挂的画作，问道：我们家的物件，怎么挂到这里来了？他的家僮出来伺候老爷，陈音斥责说：你跑到这里来干啥？家僮说：这就是家呀！这一下，有些恍惚的陈长官才明白过来。谬误种种，原因各有不同。

书人书事

《古今笑史》品类读札之六

谬误——原无定名

杨建民

冯梦龙首先说：“谬误”原无定名。是说它在当时没有确切定义。那么我们也直接从例证去看。

涪州有一座纪念杜甫的庙宇。因为杜甫曾担任过左拾遗的职务，此庙称作杜拾遗庙。不料普通大众听不懂这些莫名的官衔，传久了，口头中成了“杜十姨”。既然是“姨”，当然是女性，人们便在庙中塑造了一座妇人像，向这位“十姨”烧香朝拜。以讹传讹，听音误字，此为“谬误”。这还没完，这里另一处

还供着一“五撮须相公”，人们看着这个相公单调，怕他寂寞，便将“杜十姨”像移过去，让他们相互有个照应。其实，这“五撮须”即春秋时的伍子胥。百姓好心，不顾时代错差，把两位名人“书生”“姨”搭配居于一处。

这错还不算完。有一处江陵村，也供奉着伍子胥。时间久了，百姓听音称为“五髭须”，便雕塑了五位男子，各个装了不少长须。祭拜时，为了区分，按顺序称为“一髭须”“二髭须”……“五

髭须”。古代时，信息难通，限制了人们见闻。唐代的刘秉仁，被派任职江州(九江一带)刺史。驮运行李用了一只骆驼。到了当地，便在庐山脚下散放了。当地山民见到，大为惊异，居然鸣鼓聚众，把骆驼射杀。他们把此情况告知到州里说：我们在山里获得一只“庐山精”。刘秉仁便命他们把此精怪送来。结果一看，正是自己散放的骆驼。这种谬误，正是信息不通，见识少所致。

有时谬误也是“呆”造成。说是有一个叫陈音的官员，文章还不错，可性情却有恃恍惚。一天退朝时，他对

微书评

商皓

●[美国]奥古斯都·Y. 纳皮尔著《脆弱的家庭》(刘建华译)

本书收录了不同类型家庭在不同阶段会面临的各种挑战。从人口迁徙、社会经济压力，到精神健康问题、代际关系等，这些属于现代家庭的共性问题，让每一个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共鸣。

●游鉴明著《运动场内外》

百年前的中国女性怎样看待运动？她们是否与当代女性一样在追求求变瘦的路上不遗余力勇猛前行？通过近代江南女子的健身历程，不难看出参与运动颠覆性地改变了她们此后的人生：只有走出封闭的小家，才能拥抱广阔的世界。

●[爱尔兰]科尔姆·托宾著《王尔德、叶芝、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》(张芸译)

谈到王尔德、叶芝、乔伊斯，仿佛打开了一幅爱尔兰文学地图。他们与父亲的对立和伤害，就像爱尔兰与英国的现实